

从翻译主体的“两个世界”看《论语》俄译*

田雨薇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论语》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汇编,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较于其他中华典籍,《论语》外译的版本及外译研究著作数量最多。本文依据《论语》俄译本,从翻译主体的“两个世界”角度出发,探究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两个世界”因素,以拓展翻译研究的思维;分析不同译者的身份背景、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借此寻求传统文化外译的最佳策略,以助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 翻译思维; 客观世界; 认知世界; 典籍外译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4-0090-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4.015

A Study of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Worlds” of Translators

Tian Yu-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 Confucian classic which vividly recorded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I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re more than other Chinese classics. Based on its Russian transl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worl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two worlds” on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expand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nalyzes different translators’ identity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c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seek the best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help implemen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inking; objective world; cognitive world; translating classics

1 引言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经典之作《论语》代表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早在 19 世纪初,《论语》就被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汉学家翻译成俄语。20 世纪末,《论语》又被俄罗斯汉学家译成多种俄语版本。这些不同的俄语译本在时间跨度上长达一百多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不同时期译者的主观认

知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中华文化典籍界定不明、对外译考察不足、受众口味把握不准、翻译工作认识不足、人才匮乏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质量。(贾洪伟 2017: 110) 本文在对不同时期的《论语》14 个俄语译本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论语》作者的认知世界、当时社会的客观世界与译者的认知世界、译者社会的客观世界等角度,对《论语》不同俄译本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分析,以揭示俄语译者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治隐喻俄译转换研究”(17CYY057)的阶段性成果。

2 《论语》俄译文本中作者和译者的“两个世界”

所谓翻译主体的“两个世界”是指作者和译者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侯敏 2012: 24)。翻译是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须依靠自己的理解将语篇信息尽量还原为这两个世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考虑译出原作所欲表达的这两个世界”(王寅 2005: 18)。孔子在中年时,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 14 年,去世后其弟子及其门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论语》将孔子的思想通过语录体方式记录下来,这些思想是基于孔子对于“客观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形成,它不仅反映孔子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反映孔子的“认知世界”,所以《论语》包含孔子思想的精华。作者的创作基于自身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可以说创作源于生活,但创作又高于生活,因为创作同时也建立在其“认知世界”的基础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作者的“客观世界”,同时还要体验作者的“认知世界”,以尽可能再现作者对“两个世界”的认识和描述。

基于体验的普遍性原则,《论语》的译者也同样具有“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俄国学者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 1729 年随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北京学习满汉语文,12 年后回到俄国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满汉翻译和教学工作,掀开俄国汉学翻译的第一页。19 世纪以来,俄国汉学家开始对中国儒家经典进行翻译及阐释,就《论语》而言,至 1998 年有多种俄译本。我们从中选取 14 位译者的译作,从译者所处的不同“客观世界”和所体验的不同“认知世界”的角度,揭示对《论语》核心理念的理解和诠释特点。《论语》之所以有多种俄语译本,正是因为译者所处的“客观世界”不同,也就是文化语境、社会环境、人文特点、风俗文化等不同因素影响译者的“认知世界”。文化语境决定译者的翻译目的,在翻译目的的指导下,译者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如 19 世纪俄传教团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依托《论语》了解我国的民族思想,以便寻求两种文化的相似之处,进而找到传播东正教义的突破口。当时的译者多为传教士,如柏百福的《论语》译本多用《圣经》中的词汇来解释儒学概念,可见译者所处“客观世界”的社会要求影响译者的“认知世界”。

译者的“两个世界”依附于作者的“两个世界”,同时又独立于作者的“两个世界”。从这个层面来看,翻译是一种具有体验性的认知活动,而

翻译过程的本质就是译者的“两个世界”不断趋向于作者的“两个世界”的过程。相较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华典籍的作者与译者所处的时间跨度更长,即他们的“客观世界”差异性更大,所以会导致他们“认知世界”的差异性也很大。如何在准确传递“客观世界”信息的基础上,同时保留“认知世界”的主观信息是中华典籍外译的突出问题。中华典籍的译者作为独立于作者的个体,其生活的时代、地域、语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会有很大的不同,译者与作者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译者的翻译过程就是不断地向作者的“两个世界”靠近的过程。

3 从翻译主体的“客观世界”看《论语》译者的翻译策略

翻译活动是译者在客观现实世界基础上重构话语信息的过程,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具有普遍性,翻译的跨文化、语言实践的特殊性决定翻译主体性的特殊内涵(彭勇穗 2017: 109),因而译者和作者所体验的“客观世界”也就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但《论语》作者与译者的生活时代跨度较大,“客观世界”的差异性也就更为明显,因而相较于现当代文学,典籍翻译对译者的挑战也就更大。《论语》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 年—公元前 221 年),而《论语》的俄译本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初,作者与译者生活年代相距两千多年,作者的“客观世界”远远先于译者的“客观世界”。再加上我国学者对《论语》的解读也有不同的观点,这些因素都会使外国译者的翻译过程充满困难。

此外,翻译同一文本的不同译者由于生活年代不同,即便处于同一文化环境中,所接触的“客观世界”也会有所不同。译者在不同时期搜集的原文研究资料也会不同,因而对翻译思维也有影响。例如,最早的俄语版《论语》由比丘林于 1820 年翻译。他随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中国,搜集的资料相对较为初级。而 20 世纪嵇辽拉翻译的《论语》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研究的逐步完善,国内对《论语》的研究成果丰硕,译者参阅的资料也更为丰富。嵇辽拉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参照大量对《论语》的注疏和研究成果,同时还可以比较英语、法语、韩语等多种语言的《论语》译本,以此确定儒学核心概念的译文。因而,相较于早期比丘林、柏百福、阿理克等的译本,20 世纪后期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更为准确,译文质量和接受度相对更高。

在《论语》中数字“二”共出现 7 次,其中 5 次

是与“三”连用表示虚指意义。例如: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第二十四节,“八佾篇”)文中“二三子”意为“你们这些人”(杨伯峻 2011:31)。这是卫国^①的官员在见过孔子后评价孔子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意义。此时,卫国官员的说话对象是孔子的学生们,“二三子”并不是具体的两三个人。不同译者对“二三子”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翻译时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例如:

① Пограничный чиновник города И просил дозвол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Конфуцию, говоря: «Всякий раз, как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 жаловал сюда,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лишал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идеть его». Ученики Конфуция ввели чиновника. По удалении его Конфуций сказал: «Дети мои, чего вы беспокоитесь, что я потерял место?»(Перевод Попова П. С.)

柏百福的译文将“二三子”译为“Дети мои, вы”(我的孩子们,你们)将句中“主语”译作“呼语+主语”的形式,但文中说话人是卫国请求见孔子的官员,他所指的“二三子”是尊称孔子的弟子们。柏百福的译文转换翻译视角,将说话人从卫国官员转向孔子。译文的说话人与原文不符,因而译者在译文中所表达的“客观世界”与原文中作者塑造的语境并不相符。同时,“Дети мои”(我的孩子们)多用于宗教语言,译文中将说话人身份从师者变为信徒,自然产生的话语效果也就有所不同。著名的汉学家马斯洛夫(A. A. Маслов)在评价柏百福的译文时说,“柏百福译文的另一特点就是力求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基督教义”(Маслов 2006: 22)。在柏百福的译文中,孔子的形象被宗教化,《论语》的核心思想被蒙上一层宗教文化色彩。从译者的“客观世界”来看,柏百福的父亲是神职人员,他从小深受东正教思想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未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地域、宗教等因素,而是用自己的“客观世界”去解释作者的“客观世界”,因此导致译文中表达的文化元素与作者“客观世界”里的文化元素并不相符。例如:

② Начальник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лужбы в И, желая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Учителем], сказал: — Когда сюда прибывали благородные мужи, я встречался с каждым. Ученики попросили [Учителя] принять его. Выйдя от Учителя, он сказал: «Почему вы так обеспокоены, что нет у

вас чиновничьих постов?»(Перевод Переломова Л. С.)

与柏百福的译文相比较而言,嵇辽拉的译文采取舍弃“二三子”的方法,译为“вы”(你们),用人称代词直接点明说话对象,通过上下文语境的关联性读者可以推理出代词的指代对象;用人称代词来代指孔子的弟子们符合说话人的官员身份,并且译者的视角与原文作者的视角相同,较之前者,译文的信息准确度有所提高,易于读者理解,可以避免读者对说话人身份产生歧义。例②中使用人称代词来翻译,运用意译法替换形象的翻译技巧,在译文中删去可能产生歧义的汉语意象,既可清晰表明孔子和其弟子的关系,在信息量传递准确的基础上,也可兼顾语体语境,避免读者的误解。

从译者的“客观世界”来看,由于该译本出版于20世纪末,译者的参照版本相较于早期译本更多。除参照中文注解和研究成果外,还参照日文、韩文、英文等语言的译文和注解,在理解和分析前人译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对原文的把握也就相对更加准确。嵇辽拉通过参考注释和其他语种译文的途径来体验作者的“客观世界”,使自己的“客观世界”趋向于作者的,相较而言译文更加准确。汉学家嵇辽拉1928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曾在苏联科学院东方语言所任职,从事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研究。1975年,中国兴起“批林批孔”运动时,他转到苏联科学院符拉迪沃斯托克分院,研究儒家思想及该思想对古代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在一系列译作和著作中,他不断地表达对儒家思想的新思考并作出新评论。在翻译及研究《论语》的过程中,他重点关注儒学术语的内涵和意义的解读,并从《论语》中遴选出20个儒学基本术语。他的译文与前人译本相较而言,更注重修辞,注重语体对应。对原文的句子结构改动较少,词序调整相对不多,意在保持句子的形式,保持原文中排比等修辞手段,使译文从形式到句义都更贴近原文。

③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第二十二节“述而篇”) / Конфуций сказал: «(Вы, мои) **два-три сына**, (т. е. мои ученики) считаете меня скрытым? Я не скрытен! Я не действую (без вас) — таков (я) Цю!»(Перевод Васильева В. П.)

从例③可以看出,王西里多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将“二三子”译为“два-три сына”并加以解

释说明,——“二子”是指孔子的学生。由于王西里的译文出现在19世纪,当时的译作方式倾向于直译,以借此保留原文特点,为避免直译或对译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在易产生歧义的地方在括号中加注。通读其译文可看出,译作通篇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但大量的注释信息在解决读者理解偏差问题的同时,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障碍。

当作者与译者时空差异较大,译者易受到自身所处“客观世界”的影响去理解和诠释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从而造成作者和译者认知信息的差距,进而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在《论语》俄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通过认知途径体验作者的“客观世界”,在考虑作者和译者的自然共识信息之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原作者的客观社会背景信息。例如,作者生活的年代、地理环境、人文特点等因素。在理解作者“客观世界”背景的基础上,再结合原文本信息进行翻译能够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因此,译者体验作者的“客观世界”尤为重要;反之,则会因逻辑信息混乱造成死译或误译。

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应注意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译者的“客观世界”;尽量体验作者的“客观世界”以缩小译者与作者“客观世界”的差距。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传递原文意义,避免文化误译造成的传播障碍。较之直译法,意译法能够相对减少注释的数量和单条注释的长度以及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

4 从翻译主体的“认知世界”看《论语》译者的翻译策略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译者的“客观世界”导致其“认知世界”的差异,因此促进《论语》译本的更新。不同译者的个人影响因素制约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译文诠释角度,个体差异导致对原文理解的透彻性差异,而民族群体性差异则制约文化意象的信息传递度等。同时,《论语》的翻译目的也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由19世纪初的教学用书到20世纪60年代的东方文学文选,再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把《论语》作为哲学思想著作介绍给苏联读者(田雨薇2016:170)。20世纪末,学者逐渐开始关注译作本体研究,《论语》译本开始大量以专著形式出现,发行量与再版次数也逐年上升。译者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对翻译目的的认知也就不同,对原文的诠释角度也就存在差异,《论语》译本的呈现方式也就具有多样性。

以作者的认知范围为标准,作者的“认知世界”范围往往与译者的“认知世界”范围不同。译

者的文化意识,对原作的理解阐释,译者的文学鉴赏能力等,都期待着读者去感悟、去共鸣。(吴志芳 邱棠 2007:15) 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如何跨越认知障碍并缩小与作者的文本认知差距是避免误译、提高译文质量的关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不断充实文化背景信息,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文。例如,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第二十二章,“述而篇”)国内《论语》研究者对于该篇中的“三人行”也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三人行”中的“三”是虚指,意味在众人当中,可择名师;但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将“三人行”中的“三”理解为虚指表小,强调数量少,表示即使再少的人走在一起,其中也会有我的老师,以此凸显孔子谦虚严谨的品质。根据朱熹对论语的集注,“三人行,孔子为其一,另两人一善一恶,择善者以从,恶者为戒,则二人均为我师”(朱熹1991:68)。此解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同时突出孔子谦虚的品质和好思好问的精神,较于其他版本的注解,此解最为贴切。例如:

④ **Философ** сказал: «Если **идут вместе 3 человека**, то между ними непременно есть мой учитель, я избираю из них хорошего и следую за ним, а дурной побуждает меня к исправлению». (Перевод П. С. Попова)

⑤ **Учитель** сказал: «Если **иду с двумя людьми**, то у них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есть чему поучиться. Надо взять то хорошее, что есть у них, и следовать ему. От нехорошего же надо избавиться». (Перевод В. А. Кривцова)

不同的译者对作者的“认知世界”理解不同,也就是译者与作者“认知世界”的趋同度不一,因而出现不同质量的译文。上述两个译例分别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柏百福的译文(例④)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三人行”译为“идут вместе 3 человека”(三人前行,其中有一位为我的老师),这与朱熹对论语的注释“三人同行,其一我也”(朱熹1991:68)不符,即原文中所指的“三人”中应包括说话人孔子本人。他的译文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将“三人行”翻译成直接引语,未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

而汉学家克利夫佐夫的译文(例⑤)采取第一人称视角,翻译成直接引语“я иду с двумя людьми”(我与两人同行),译文的三人中包括说话人孔子本人,表示同行的两人中有我的老师,符合原文“三”的虚指缩小用法。与例④中的孔子

形象相比,例⑤中的孔子形象更贴近于原文,符合作者创作意图。同时例⑤传达出为人应谦虚好学、敢于请教的精神,与孔子的“认知世界”相符。

克利夫佐夫在译本的序言中对孔子、儒学思想的要义、《论语》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论语》在各个历史朝代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的介绍,可见在译者的认知思维中,他对原作中所描绘的孔子形象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译文更贴近原文;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照多种《论语》的注疏,借助注疏家的诠释来理解作者的“认知世界”,从而缩小文化和语言差异带来的思维障碍。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应准确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调整翻译视角,以准确传达作品信息。例如,对于直接引语的翻译,建议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以此直接体现说话人的态度。虽然也可以通过第三人称视角翻译直接引语,但须要根据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对句式结构进行调整。其次,参考注疏家的注解是正确理解原文内容及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途径,借此可以缩小由于文化障碍产生的“认知世界”差异。做好原作及作者背景信息的梳理和了解文化语境也能够有助于缩小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并有益于提高译文的准确性。

作者的认知思维决定其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对文本中形象及概念的塑造和阐释,译者对作者“认知世界”的了解有助于译者对文本的正确解读。由于作者的“认知世界”基于“客观世界”而形成,所以译者应从体验作者生活的“客观世界”入手,以原文为媒介,充分考虑影响作者“认知世界”的个人因素,了解作者的“认知世界”,以此使译者的“认知世界”趋同于原文语篇中的“认知世界”;译者了解创作背景、艺术特色等作者个人因素会有利于准确理解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反之,会造成译者对作品理解的偏差,导致译作中出现歧义信息。

5 结束语

翻译是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从翻译主体的

“两个世界”来探索译者翻译思维有利于拓展翻译的研究范围。首先,要通过语言手段翻译作者或作品的“客观世界”和文化语境;其次,要增大译者“认知世界”和作者“认知世界”的趋同度,要认识和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以避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发挥,因而造成文本信息的误解及误读;最后,译者对读者的预判,即对读者“客观世界”及“认知世界”的预期,基于此产出更为贴切的等效译文,从而更好地传达作者和文本的意义。本文阐释《论语》俄译本中作者和译者“两个世界”的关系,并借此分析译者的翻译思维。译者应尽可能通过认知途径体验作者的“客观世界”并了解作者的“认知世界”,使作者和译者的“两个世界”尽量趋同,以减少译文中的各种错误。

注释

①卫国是中国周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第一代国君为周文王嫡九子康叔封。

参考文献

- 侯敏. 认知视阈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贾洪伟.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推进路径研究[J]. 外语学刊, 2017(4).
- 彭勇穗. 异质感中的翻译主体性——论施莱尔马赫的“送读者到原作者处”[J]. 外语学刊, 2017(6).
- 田雨薇. 《论语》俄文版译介史研究[J]. 山西档案, 2016(5).
-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2005(5).
- 吴志芳, 邱棠.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制约中的能动性[J]. 上海翻译, 2007(2).
- 杨伯峻. 论语[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朱熹. 论语集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 Маслов А. А. Конфуций «Суждения и беседы» [M].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Феникс, 2006.

定稿日期: 2018-05-29

【责任编辑 王松鹤】